

中古漢語分期及相關問題^①

周俊勳

漢語有悠久的歷史，爲了清楚地描寫不同時期漢語的特徵，把握漢語發展演變的脈絡，對漢語史進行分期研究是必要的。本文不打算討論整個漢語史的分期，祇擇要介紹有關中古漢語分期的一些主要觀點及相關問題。

—

從國內外的研究看，已有的中古漢語分期主要有以下一些觀點：

王力（1958）、向熹（1993）把漢語分爲四個時期，中古期爲公元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劉世儒（1959）在談到量詞的發展時說，中古漢語主要是指魏晉南北朝時代，但也可以上包漢末，下括唐初。朱慶之（1992）指出：“所謂‘中古’本是一個比較含混的時段概念，我們用來指東漢魏晉南北朝。由此上溯，秦代以前是上古時期，當中的西漢是上古至中古的過渡；由此向下，晚唐五代以後是近代時期，當中的隋唐是中古至近代的過渡。”王雲路、方一新（1992）提出：“用‘上古漢語’來指代傳統所說的‘古代漢語’，用‘中古漢語’來指代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特別是富含口語文獻的語言。西漢可以看作是從上古漢語向中古漢語演變的過渡時期，初唐、中唐則可以看作是

從中古漢語向近代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魏培泉（2000）從語法特徵方面綜合各家的觀點，指出：“寧可把東漢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的漢語稱爲中古漢語，也不願把它視爲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間的過渡階段，因爲它歷時有五百多年，而且維持一套獨特的語法特徵時間也是相當長的。”

國外漢學家對中古漢語的界定也不統一。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認爲六朝到唐是中古漢語；加拿大漢學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在 20 世紀 70 年代使用“中古漢語”（Middle Chinese）這個名稱時，沒有具體指明時間段^②；在日本，一般把六朝至唐末稱爲“中古”或“中世”^③。但針對不同的研究領域，中古漢語所指的時代不同，如佐藤進（2005）說：“一般而言，日本學者把‘中古漢語’這個用語作爲音韻史上的時代區分名稱。而詞彙語法的歷史研究我們日本學者採用‘六朝漢語’這個名稱。”可見，日本中國語學界在詞彙上認同將六朝時期作爲中古。而且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④，就將漢魏六朝劃爲一個相對獨立的時期，並進行專門性的語言研究，他們稱之爲“六朝漢語”。志村良治（1967）說：“這裏所說的中世漢語的時期，指從魏晉至唐末五代。與此相應，以漢末與北宋爲參考時期。通常把這一時期的漢語稱爲‘中古漢語’。”太田辰夫（1991 [1988]）認爲：“‘中古’一詞，中國多指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但從語言史的角度來看，晚唐時代白話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應屬‘近代漢語’時期……隋代歷時很短，故不另加考慮，權且劃歸中古。”又：“中古，即魏晉南北朝，在漢語史的時代劃分中相當於第四期。這個時期是古代漢語的質變期。”

可將上述學者及其他一些學者的分期總結成表 1：

表 1 國內中古漢語分期時段表

研究者	名稱	前過渡期	主幹時段	後過渡期
王力 (1958)	中古	四世紀	晉、隋、唐	南宋前半
劉世儒 (1959)	中古	漢末	魏晉南北朝	唐初
潘允中 (1982)	—	—	晉、隋、唐五代	—
朱慶之 (1992)	中古	西漢	東漢魏晉南北朝	隋唐
王雲路、方一新(1992)	中古	西漢	東漢—隋末	隋末
汪維輝 (2000)	中古	—	東漢—隋末	—

表 2 國外中古漢語分期時段表

研究者	名稱	前過渡期	主幹時段	後過渡期
高本漢 (1940)	中古	四世紀	五一六世紀	七世紀
志村良治 (1967)	中古/中世	漢末	魏晉—唐末五代	北宋
太田辰夫 (1988)	中古	東漢 (1/3 世紀)	魏晉南北朝	六世紀
貝羅貝 (1995)	—	二世紀	三一十二世紀	十三世紀
孫朝奮 (1996) ^⑤	中古	—	201—1000	—

從各家的劃界看，中古漢語的分期還未完全達成共識。以魏晉南北朝為中心是沒有異議的，但關鍵問題是怎樣處理上下限的劃分。上起東漢異議較少，下與近代漢語的交接點分歧較大。這種分歧實際上反映了中古漢語劃界的尷尬。一方面反映出各家對中古漢語分期標準的認同差異，同時也說明目前對中古漢語內部特點的研究不夠。

二

目前各家分期大體上可歸結為語音、語法、詞彙標準。比如高本漢 (1940 [1915]: 21) 說：“《廣韻》的反切是代表一個不比紀元六百年更後的完整的中國語言了。可是它也很可能比這個時代更早。……我們可以說這個反切是紀元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間的一個語言。這個語言我們可以叫作中古漢語 (l'ancien chinois)。這

個時期以前的叫做上古漢語跟太古漢語。以後的叫做近古漢語。”錢玄同（1918）《文字學音篇》把漢語語音的演變分為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現代等六個時期。他們都是依據語音來劃分的。王力（1958）認為漢語史的分期應該立足於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綜合考慮語音、語法、詞彙的變化，但語法的變化是語言發展的關鍵^⑥。他總結中古時期的語言特點是：（1）在口語的判斷句中係詞成爲必需的句子成分；（2）處置式的產生；（3）完整的“被”字式被動句的普遍應用；（4）形尾“了”“着”的產生；（5）去聲字的產生，等等。從這些特點看，主要是運用了語法標準。魏培泉（2000）祇運用了語法標準。汪維輝（2000）從常用詞的變化情況來分期^⑦，指出東漢特別是東漢後期，“就常用詞而言，更多的是表現出與魏晉南北朝的一致和與先秦西漢的歧異。……把它和魏晉南北朝聯在一起恐怕更符合實際。從詞彙角度看，把東漢一隋這一階段作爲漢語發展史上一個相對獨立的時期，並把它稱爲‘中古漢語’以對應於‘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這樣的分期法是合理的”^⑧。方一新（2004）專門從中古詞彙的角度討論了有關中古漢語的分期問題^⑨。

語言內部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的變化並不一致，按照各自特徵劃分出來的分期也就必然存在差異。綜合語法、語音、詞彙三方面的特徵來分期較爲合理，但要在漢語發展史上找到一個三者完全吻合的時期非常困難。所以，志村良治（1995 [1984]: 4）認為劃分時代問題，本身難點很多，“漢語史的劃分必須根據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進行，但絕非容易做到。……在音韻體系的變化方面，主要是前漢末到六朝時期的變化難以弄清。在把握語法、詞彙的變動方面，不易掌握其發生質變的實際情況。以上種種全是問題。如果對漢語史的時代劃分僅僅作爲權宜之計的話，這種皮毛式的分法，哪一種都可以”。事實也確實如此，漢語史分期祇能以反映某一時期語言的本質特徵爲標準。

三

那麼根據什麼來研究漢語的這種本質特徵？呂叔湘認為應根據白話資料。他（1985）在《近代漢語指代詞·序》中根據白話資料的出現情況提出漢語史“二分”的觀點：

什麼是近代漢語？這涉及漢語史的分期問題。一種語言在某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就可以把這以前和以後分為兩個時期。可是語言的演變祇有通過書面記錄纔得以觀察，而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記錄語言的文字的影響。漢語是用漢字記錄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難於如實的反映口語。秦以前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至於太大，但漢魏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相當固定的書面語，即後來所說的“文言”。雖然在某些文章中會出現少量口語成分，但是以口語為主的“白話”篇章，如敦煌變文和禪宗語錄，却要到晚唐五代纔開始出現，並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纔取代“文言”的書面漢語的地位。根據這個情況，以晚唐五代為界，把漢語的歷史分成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是比較合適的。

呂叔湘在這裏將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歸入上古漢語。他1986年為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彙釋》作序時，又將三國到唐末作為上古漢語向近代漢語的過渡階段。他說：

以語法和詞彙而論，秦漢以前的是古代漢語，宋元以後的是近代漢語，這是沒有問題的。從三國到唐末，這七百年該怎麼劃分？這個時期的口語肯定跟秦漢以前有很大差別，但是由於書面語的保守性，口語成分祇能在這裏那裏露個一鱗半爪，要到晚唐五代纔在傳統文字之外另有口語成分佔上風的文字出現。拿目前這本書裏邊的詞語來看，從古典書面語的立場說，這些都是“俗語”，也就是說，都可以算是近

代漢語的“露頭”。

他也從三國到唐末這段時間實際保存的白話資料情況來考慮它的歸屬問題。從漢語發展的歷史來看，這種主張是有道理的。由於口語資料缺乏，研究漢語史祇能依靠書面語。漢語書面語又存在“文言”和“白話”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它們各有自己的發展史^⑨。文言史儘管也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但自從秦漢時期定型以後，它就大體上維持着原來的詞彙、語法系統，這個系統不能反映漢語口語的真實面貌，當然不能據此來給漢語史分期^⑩。漢語史的分期，必須根據口語的狀況（蔣紹愚 2005）。但歷史上口語的狀況，又祇能通過那些反映口語的書面語來瞭解，這個“反映口語的書面語”就是白話。因此，漢語史的分期應根據白話的語音、語法、詞彙的特徵來進行。三國到唐末的口語儘管與先秦有很大差別，但由於沒有能夠反映口語情況的資料，無從進行研究，祇能暫時劃歸古代漢語。在更多晚唐以前的白話資料被發掘出來之前，這祇是一種權宜的劃分方法。

四

這種根據白話資料來進行分期的思路應得到足够的重視。因為口語與書面語的對立貫穿於文字產生後的整個漢語歷史當中，而漢語書面語至少從東漢開始就一直存在“文言”和“白話”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給漢語史分期時必須考慮口語、白話和文言文之間的關係。如下圖^⑪：

	東漢—隋	唐	唐末五代
口語	a	b	c
白話	A	B	C
文言	W ₁	W ₂	W ₃

圖 1 口語、白話、文言關係

對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兩點說明：其一，代表三個時段的口語的 a、b、c 可能是不同的。白話與口語平行發展，隨着口語的變化而調整其詞彙、語法系統，盡量反映出口語的真實面貌。因此代表三個時段的白話的 A、B、C 也可能存在差異。其二，a、b、c 之間是變化的關係，A、B、C 是反映 a、b、c 的，所以 A、B、C 之間也應該是變化的關係，而不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關係。從這個角度說，認為古白話系統經歷了一個口語成分不斷增加的量變過程，最終質變為現代漢語書面系統的說法是值得考慮的，那種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處於由文言逐漸轉變為古白話的歷史過渡時期”的說法更值得懷疑。

如果以上推論成立的話，那麼祇要有足夠的語料證明 A、B、C 三者之間的語言特徵及其差異，在 A、B、C 三者之間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劃界分期。A 是否能夠代表東漢—隋的實際語言面貌就是中古漢語能否獨立出來的關鍵。

那麼 A 能否反映東漢—隋的實際語言面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對漢語書面材料的性質進行深入一點的研究。漢語書面材料包含文言和白話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在理論上可能存在以下四種情況：（1）言文一致，即怎麼說就怎麼寫，完全實錄；（2）言文基本一致，以口語為主，摻雜一些文言成分；（3）基本脫離當時漢語實際面貌的文言文，即以文言為主，摻雜了一些口語成分；（4）言文分離，即說一套，寫一套。第（1）類當然屬於白話，第（4）也祇能是文言了。在實際的漢語書面材料中，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純粹的文言和白話，祇存在第（2）和第（3）類，它們代表了整個漢語書面語。

第（2）類、第（3）類一般被籠統地稱為文白夾雜，但實質上它們是性質不同的兩個系統。因為在句法、詞彙方面第（2）類大體上反映的是口語系統，第（3）類却是文言系統，它們的不同不是口語成分的量的差異，而是不同性質的區別，即前者屬

於白話，後者屬於文言。這祇是理論上的劃分，實際情況遠比這個複雜，具體做起來也會遇到很多困難。蔣紹愚（2005）據衆多研究成果，將晚唐五代的敦煌變文、禪宗語錄歸於第（2）類，這是正確的。東漢開始的這些材料怎樣處理？全部處理為第（3）類顯然不妥，全部劃歸第（2）類似乎也不盡符合實際情況。六朝和唐代也有一些十分白話的文人作品，如《奏彈劉整》和《遊仙窟》，當然比較少^⑨。又比如同樣的佛經翻譯材料，支讖和支謙的譯經就不同，支讖的口語性高，可看作第（2）類，而支謙譯經文言成分高，可看作第（3）類。根據現存語言資料以及學者們對這些資料價值的研究，可將東漢至晚唐五代的口語、書面語、白話系統列為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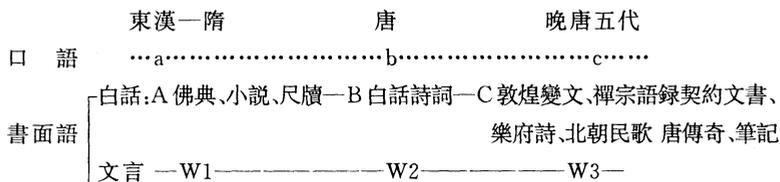


圖 2 實際白話資料保存情況

呂叔湘根據唐五代出現的敦煌變文、禪宗語錄這類白話資料對漢語史進行“二分”，充分顯示出其獨到的學術眼光。A、B、C 三者之間語言性質可能不一樣，呂先生是清楚的。之所以將錢劃在 C，是因為 C 與 W3 之間的語言特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依靠敦煌變文、禪宗語錄等白話資料與文言文的比較研究發現的。把 A、B 看作是 C 的“露頭”，不是說這種語言本身，而是說反映這種語言的文獻的“露頭”。這種認識是有原因的。因為在 20 紀 80 年代中後期以前，人們沒有對漢譯佛典從語言學角度進行專門的深入研究，對其語料性質認識不清。甚至得出這個時期祇有白話資料，沒有白話典籍的結論（張中行

1988: 204)。換言之，可以這樣來理解，當時人們明白 A、B 與 W1、W2 存在差異，但僅就中土文獻來研究^④，A、B 不能像 C 那樣提供足夠的信息來反映這種差異特徵，即呂叔湘說的“這個時期的口語肯定跟秦漢以前有很大差別，但是由於書面語的保守性，口語成分祇能在這裏那裏露個一鱗半爪，要到晚唐五代纔在傳統文字之外另有口語成分佔上風的文字出現”。隨着學術的發展，尤其是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至 90 年代，人們從語言學的角度對這個時期大量漢譯佛典進行深入研究（許理和 1987 [1977]；朱慶之 1992；俞理明 1993；梁曉虹 1994；顏洽茂 1997），發現大量的漢譯佛典的口語成分不止“露個一鱗半爪”，它和口語的關係與敦煌變文、禪宗語錄和口語的關係在性質上是基本相同的。

五

經過衆多學者二十多年的研究，漢譯佛典的語言性質和語料價值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原，爲宣傳教義，使目不識丁的百姓都能聽懂，一些僧人在翻譯佛經時不得不放棄使用典雅的文言，而採用一種跟當時口語十分接近的文白夾雜的文體，因爲宣傳佛法的專業人士 bhqzaka（說者）或 dharma-bhqzaka（說法師）的主要職責是以各種方式來大聲誦讀經文（朱慶之 1992；梅維恆 1994；江藍生 2000）。這說明早期漢譯佛典與口語有非同尋常的關係，中古大部分漢譯佛典是以當時口語爲基礎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當然，漢譯佛典具有口語俗語和不規範成分與文言文的混合、漢語和外語的混合兩種特點（朱慶之 2001），其語料性質與晚唐五代的敦煌變文、禪宗語錄不完全相同。另外，作爲書面語基礎的口語一般是通語，而不是方言。在漢語裏，方言一般是沒有書面語的。但在中古時期，情

況可能不同，佛經語言的口語基礎可能不僅僅是通語，還有其他方言。這使得強調系統性的語言研究的難度進一步增大。儘管如此，與當時大多數中土文獻嚴重脫離口語的情況相比，早期漢譯佛典的語言面貌已有很大不同。如果敦煌變文和禪宗語錄能夠作為c的代言人的話，漢譯佛典——尤其是在中古中土文獻極其缺乏口語性資料的情況下——完全可以作為研究a的替代物。要瞭解這一時期漢語的真實面貌，漢譯佛典是可資利用的最好材料。中古漢語之所以能夠獨立出來，也是因為眾多的研究顯示：這個時期的語言特點既與上古漢語不同，也與其後的近代漢語有差異。而這種研究成果所依靠的主要材料正是大量的漢譯佛典。

六

漢語史的分期不能忽視文言與白話的問題，呂叔湘在《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彙釋·序》中說：“長時期的言文分離，給漢語史的分期造成一定的困難。因此，是不是可以設想，把漢語史分成三個部分：語音史、文言史、白話史？這樣也許比較容易論述。”這是經驗之談，非常值得重視。因為漢語史研究利用的資料主要是書面材料，漢語書面材料大體上可分成文言文和白話文兩個系統，研究者可以研究文言文的語言，也可以研究白話文的語言。將文言文和白話文混在一起研究是有問題的，更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分期依據。漢語史的分期祇能以白話文的研究為基礎，據白話語料來研究中古漢語的內部特徵，並就此來進行漢語史的分期。

已有的研究成果顯示，東漢至隋的漢譯佛典的語料性質與唐初至唐末的佛經材料的語料性質有所區別。東漢至隋的語言的內部特徵也有別於唐初至唐末的語言特徵，詞彙、語法方面的特徵尤其不同（魏培泉 2000；汪維輝 2000；方一新 2004，2005）。

因此，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語言內部特徵，東漢至隋都不同於初唐到唐末，所以將東漢魏晉南北朝隋作為中古漢語的主幹部分，而將唐初到唐末作為中古漢語向近代漢語的過渡期。

七

將東漢至隋劃為中古漢語具有重要意義。這五百多年，社會大變動，民族大遷徙、大融合，這樣的社會環境直接導致各方言的交互影響、不同語言的深度接觸，對漢語發展變化的影響非常巨大。中古以降的漢語語音的變化，發展到今天現代漢語各方言的巨大差異，大都可以從這些融合和接觸找到部分解釋。比如北方話入聲的消失、聲調的簡化等等，當然與入侵北方的非漢民族語言的無聲調或少聲調有關。尤其是東西漢之交佛經傳入漢地，漢語有史以來第一次系統歐化（朱慶之 2001），肯定會對漢語產生影響。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漢語固有的語言模式，不僅導致漢語詞彙產生巨大的裂變，新詞新義不斷產生，舊詞舊義發生面貌各別的演變，漢語詞彙雙音化的現象以空前的速度發展，而且還可能對構詞法等產生極大的影響。中古漢語的獨立能夠為研究漢語歷史發展演變的原因和機制提供最佳的切入點。

〔注釋〕

- ①本文是作者博士後工作報告《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與詞典編纂》中的一部分。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朱慶之先生的諸多指教，邱冰師妹對行文也作了不少潤色。謹致謝忱。
- ②如 Pulleyblank, Edwin G. 1970—71. Late Middle Chinese. *Asia Major* 15: 197—239; 16: 121—68. 又 1978.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to Earl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 2: 173—203. 他的 Middle Chinese 又分前期 early 和後期 late, Early Middle 指的是《切韻》為代表的音, Late

Middle 指的是以盛唐時期的長安音為代表的音。

- ③如 [日] 松江崇 (2005) 編制的《日本近二十五年來中古漢語研究文獻目錄》中說：“所謂‘中古漢語’主要指從東漢到中唐的漢語。” (收入朱慶之編《中古漢語研究 (二)》，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④如吉川幸次郎 (1946)《六朝助字小記》研究了六朝時“定”“將無、將不、將非”“頗”“何物”等助詞的新義和新用法。這篇論文影響很大，促進了包括口語成分在內的六朝漢語研究。
- ⑤孫朝奮 (1996: 3) 分為四個階段：上古漢語 (Old Chinese 500b. c. - A. D. 200)、中古漢語 (Middle Chinese 201-1000)、近代漢語 (Early Chinese 1001-1900) 和現代漢語 (Modern Chinese)。
- ⑥他認為：“如果語法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就可以證明語音的質變了。語音和語法有密切關係，都是整個系統，所以語音的演變也可作分期的標準。”一般詞彙的發展也可作分期的一個標準，但不是主要的標準。
- ⑦方一新 (2004) 對這 41 組常用新詞、舊詞更替演變開始的年代作了一個統計，為先秦 16 組，西漢 12 組，東漢 12 組，魏晉 1 組，南北朝沒有。先秦儘管在數量上佔的比例不小，但主要集中在《韓非子》、《晏子春秋》、《莊子》等幾部著作中，且用例十分罕見。說明祇是萌芽狀態，取代舊詞一般要到東漢以後。
- ⑧汪維輝 (2000: 416) 引證柳士鎮 (1992) 得出的結論：“同先秦兩漢語法相比，此期的總體特徵是新舊語法形式的交替。”引證周祖謨 (1993) 語音史的結論，指出：“就東漢至隋這一歷史階段而論，語音史專家和語法史專家的研究結論跟我們從常用詞方面考察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可以互相印證。”
- ⑨他把中古詞彙特徵概括為：(1) 文白分歧明顯，早期白話作品中口語詞、俗語詞大量增加；(2) 舊的概念使用新的詞來表達，詞彙複音化成為趨勢，詞所承載的新義位大量產生；(3) 基本詞彙開始產生變化，新詞與舊詞并存並逐步取代後者；(4) 構詞法有新的發展，附加式複音詞大量出現。
- ⑩梅維恒 (1994) 說：“文言和白話實際上屬於完全不同的語言範疇，前者是一種遠離言語的半密碼，後者跟活的漢語的口頭形式具有緊

密的一致。”又說：“語言研究發現，文言與白話自產生之時起，一直就是兩個有區別的系統。”江藍生（2000）：“從漢語發展的歷史來看，大概自古以來書面語就跟口語不完全一致。”

- ⑩袁賓（1992）也認為近代漢語階段存在於部分文獻裏的文言文儘管孱雜入少量的口語成分（這些口語成分自然是近代漢語的研究材料），但沒有改變這種書面語言的性質，不能從中看到實際語言發展、演變的真正情況，所以它祇能是“古代漢語在書面上的延續，並不是近代漢語”。
- ⑪圖中文言欄 W1、W2、W3 表示文言文大致保持不變。但事實上，文言文也是一直處於變化之中的。
- ⑫唐代傳奇和類書中也有不少屬於白話作品。可見文獻的內容和對象是影響其語言的重要因素。
- ⑬中土文獻中能充分反映中古漢語特色的材料非常單薄。從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看，無非圍遶着幾部小說與筆記做文章。加上樂府民歌，雜帖、契約文書如《僮約》、《失父零丁》、《汜勝之書》等白話作品，數量仍有限。

〔主要參考文獻〕

- 方一新．從中古詞彙的特點看漢語史的分期．漢語史學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4）
- ：20世紀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朱慶之編．中古漢語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 江藍生．古代白話說略．北京：語文出版社，2000．
-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 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梅維恒（Victor. H. Mair）1994：佛教與東亞口語化的書面語的興起：國語的產生（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JAS53，

no. 3, pp. 707—751.

- 王 力. 漢語史稿. 北京: 中華書局, 1958/1980.
- 向 熹. 簡明漢語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蔣紹愚. 近代漢語研究概要.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 劉世儒. 論魏晉南北朝的量詞. 中國語文, 1959 (11).
- 朱慶之.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2.
———佛教混合漢語初論. //語言學論叢. 第24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 王雲路, 方一新. 中古漢語詞語例釋. 長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 魏培泉. 東漢魏晉南北朝在語法史上的地位. 漢學研究. 第18卷特刊. 又//朱慶之編. 中古漢語(二).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5年.
- 佐藤進. 日本學者中古漢語詞彙語法研究的概況. //朱慶之編. 中古漢語研究(二).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5.
- 志村良治. 中古漢語の語彙語法. 日本: 大修館書店, 1967.
———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 江藍生、白維國譯.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 太田辰夫. 漢語史通考. 江藍生、白維國譯. 重慶: 重慶出版社, 1991.
- 許理和. 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 蔣紹愚譯. //語言學論叢. 第十四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7.
- 顏洽茂. 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彙研究. 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7.
- 俞理明. 佛經文獻語言, 成都: 巴蜀書社, 1993.
- 袁 寶. 近代漢語概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張中行. 文言和白話.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周祖謨. 魏晉音與齊梁音. //周祖謨學術論文集. 北京: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3.
- Sun Chaofen. 1996. Word—Order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yraube, Alain 1995.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C. —

• 344 •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十輯

T. James Huang & Y. -H. Audrey Li (eds.). 1996.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周俊勛 西南交通大學/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 郵編: 621000)